

Y 2363

山西文史资料

1989年第4辑

(总第64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山西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 山西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

顾 问 王 西 姚莫中 郝树侯

主 任 李蓼源

副主任 乔志强 李裕民 张 友

姚文锦 韩秋云

委 员 刘子威 赵修身 尹世明

贺德宏 李俊虎 罗广德

马 明 杨小池 张海瀛

张豪若 刘纬毅 范仁贵

曹秋恒 霍成勋 孙凤翔

刘海清 叶昌纲 张正明

史法根 翟品三 杨玉印

刘存善 赵政民 霍 军

主 编 李蓼源

副主编 赵政民 霍 军 王艾权

目 录

刘亚雄生平简述	徐 冲 (1)
在“一二·九”运动中成长	黎 颖 (34)
我所经历的道路	刘慕真 (50)
辛亥革命老人杨紫霞	张全盛 (64)
永做齐门一弟子	杨秀珍 (79)
平凡的历程	郭吾真 (89)
著名女摄影记者侯波	武胜利 (108)
创建我国感光材料课程的经过	吕锦璇 (111)
在太原女师读书的日子	林 薇 (122)
牛桂英与晋剧艺术	志 冲 (133)
程玉英的舞台生涯	刘思奇 (160)
追随南丁格尔的一生	武文翠 (176)
热心女子教育事业的孟石兰	李 玫 (184)
通愿法师事略	如 瑞 (190)

文史研
究信息

孙凤翔副教授与内田知行副教授 关于阎锡山研究的通信

—附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副教授郭凤明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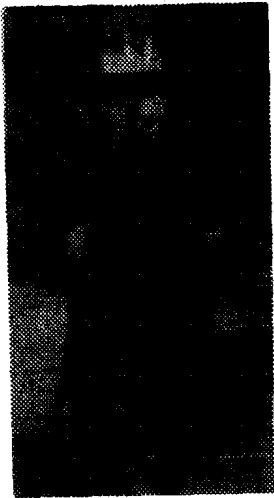
阎锡山研究资料目录..... (193)

质疑·订正·补充..... (88)

刘亚雄生平简述

○ 徐 冲

(一)



在中国人民的伟大革命斗争和建设事业中,妇女是重要的一翼。“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忠诚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内杰出的妇女工作者、社会活动家”^①刘亚雄同志,便是她们的优秀代表。

1901年10月22日,刘亚雄诞生在山西兴县黑峪口村一个没落的地主阶级家庭里。

刘家祖上原本是贫苦的农民。刘亚雄的高祖父凭着勤奋的劳动和灵活的经济头脑与手段,晚年置办下数百垧土地,打下16孔石窟。然而刘家的发家犹如昙花一现,曾祖父嗜吸鸦片,不仅伤财,且戕害体魄,而立之年便早早辞世。祖父刘守谟不会持家,且有“名士癖”,读书不精却热衷功名,花钱买了个秀才名分,然后大兴土木以彰功名;同时他又兼有“侠士”风,专好抱打社会不平,不惜重金济人之难,气魄豪爽豁达,41岁那年为一桩土地公

注①《刘亚雄同志生平》,1987年3月4日《人民日报》

案仗义包讼，终因对方串通官场衙门败讼，气病交加，溘然长逝。祖上惨淡经营的一份家业，经两代人的挥霍败落了十之七八。

刘亚雄的父亲刘少白，虽然在清王朝覆灭前最后一次科考中考取了一名贡生，然而伴随着清王朝的倾覆与辛亥革命的狂飙汹涌而来，年轻的刘少白对科学与民主的崭新思想发生了兴趣，对传统的封建宗法思想由怀疑而逐渐加以否定，思想深处萌发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胚芽。随着社会革命的历史进程，他终于在探求民族解放真理的道路上摸索前进，成了一位充满爱国心、正义感的开明士绅。从20年代起，开始认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真理，从而不断自觉地支持、帮助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面临生死存亡紧急关头的“七·七”事变前夜，终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真正走上了为无产阶级解放事业而献身的光明之路。

刘亚雄是刘少白的长女，她一生所走过的充满坎坷、不懈奋斗的道路，自始至终都和父亲的影响分不开。

不过，父亲长年在外奔波，在家里，高祖母郭氏对刘亚雄早年性格的形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高祖母贤淑能干，为人达观，不重封建规训，在这个差不多五世同堂的家族里，享有崇高的威信。她极其疼爱刘亚雄，从而使刘亚雄在这个家庭里处于一种微妙的特殊地位。刘家五代仅生此一女，加之高祖母对封建社会里妇女地位卑下的痛苦有深刻的体会，所以更视刘亚雄为掌上明珠，特意同意给刘亚雄起了个“种子”的小名，以求女孩在刘家繁衍，绵延不绝。高祖母对刘亚雄百般疼爱、千般庇护，凡事纵惯忍让，由其使性，逐步培养了刘亚雄放任不拘的性格。农村女孩到了缠足的年龄，刘亚雄死活不愿受那份罪，父亲刘少白支持女儿的态度，高祖母顺水推舟同意刘少白的意见，于是刘亚雄便成了黑峪口一带唯一不缠足的女性。

刘亚雄的任性塑成她男孩子般的性格。儿童时代即不喜欢女红，偏和村里贫家野气十足的男孩子们厮混在一起，攀树爬墙，

打瓦踢毽，奔跑嬉戏，有高祖母护着，家里谁也不敢把她怎么样。后来她索性穿起男孩子的长袍马褂，头戴一顶瓜皮小缎帽，“吧嗒”着一双光脚，山里村外、河沟塬畔到处乱窜，一时间成了全村尽人皆知的“假小子”。

8岁那年，高祖母命她到外村娘舅家去读私塾。舅老爷高龄，是个前清秀才，为人古板，思想守旧，是一位迂腐气十足的老道学先生，每日责令刘亚雄和几个其他孩子目不斜视地读圣贤书，描大字模，一丝不苟。“野”惯了的刘亚雄实在忍受不了这种所谓“非礼勿听，非礼勿动”的沉闷学习环境，对那些《千字文》、《百家姓》、《烈女传》等诗书文章极无兴趣，因而不肯用功，无论舅老爷怎样戒训都不见“长进”。其实刘亚雄并非“难雕”之朽木。她天资聪颖，反感的只是古旧板滞的东西，对一切新鲜、活泼、自由的事物兴趣极浓，比如父亲给她买来的《新女儿经》一类具有新观点的书就爱不释手，若干段落过目不忘，例如“我华人口四万万，女子占一半”这样的句子，直到晚年，刘亚雄亦记忆犹新。

(二)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揭开了中国近代史崭新的一页。正在太原武备学堂求学的刘少白，成了辛亥革命的积极参加者，当上了山西省新政府临时参议员。他的思想，伴随着国民觉醒的新思潮，集中在妇女解放的焦点上。因此，他把年仅11岁的女儿刘亚雄从兴县黑峪口老家接到省会太原，送进阳兴公立女子学校读书。刘少白认为：“女子未必不丈夫！”于是给女儿取了正式官名“刘亚雄”。

刘少白在太原尚无房产，只好将女儿寄寓在同乡白云轩家里。白云轩是兴县知名大地主，广有田产，思想却不守旧，奉行“实业救国”宗旨，曾留学欧洲，吸收资产阶级经营企业经验，

后回山西开发煤矿，任保晋煤矿公司经理，也是当时颇有名气的实业家。

少年刘亚雄初涉社会，就跨入了新时代新思想的产物——阳兴公立女子学校，又住在白云轩这样充满民主气氛的家里，因而环境的改变给她带来了清新的空气，无疑与她儿童时代的性格志趣发生了谐振。在这所学校里，刘亚雄读书三年多，由于家庭经济拮据，迫于生计，1914年底，终于被父亲送回了兴县老家。

刘亚雄离开父亲感到遗憾，但是最使她难过的还是离开太原，这意味着学业的半途而废，对于希冀将来依靠自己的力量在社会上立足奋飞的女性来说，这标志着事业的完结。刘亚雄不愿意屈服于环境，走当时一般农村妇女任人支配命运的道路，她决心驾驭自己的命运，于是一改常性，整天闭门不出，埋头温习功课，做进一步学习的准备。

1916年夏，刘少白在阳兴中学谋到了语文教师的职业，又因为编写教材获得一笔稿酬，紧张的经济状况得到一定程度缓解。时值太原女子师范学校招生，刘亚雄得到父亲的支持，勇敢应试，结果以优异的成绩被录取，至1921年，刘亚雄在这所学校整整呆了五年。

太原女师，是顺应新思潮而诞生的一所新型学校。然而，如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初潮时期的许多新学一样，只不过是形式的变化而已，实质上，学校里几乎保持着旧时代的一切特征。这必然和刘亚雄追求新潮的思想发生尖锐矛盾。在这里，刘亚雄经受了第一次政治风云的战斗洗礼。

1919年“五·四”运动的雷鸣，震荡着刘亚雄的心胸。作为第四班班长，她立即行动起来，和同学石汝璧、王淑英等办起了墙报，反对列强侵略，历数军阀罪行，反对封建禁锢，大胆喊出“自己解放自己”的战斗口号，并且直截了当地揭出学校流弊，反对作文使用文言，大胆地提出革新课文内容的主张。墙报

不大，却以清新的内容在同学中产生强烈影响，使反动校方大为恼火。而真正把刘亚雄推向与校方正面冲突最前列的，还在于轰动一方的两件事。

刘亚雄同班同学赵文静，家庭包办的婚姻使她神情抑郁极为痛苦。刘亚雄对她的不幸遭遇愤愤不平，支持她争取离婚的权利。但是封建势力和社会环境的压力相当沉重，赵文静悲叹人生，感伤自己，既不甘心受人摆布，又缺乏奋争的勇气，终于跑到城外出家当尼姑去了。

刘亚雄认为此举动摇不了封建压迫的根基，没有太大的意义，于是她主动与另外两个同学潜出校门，找到赵文静，苦口婆心地劝她返校。校方当局认为此事沾污了学校“清白”名声，决定惩处“忤悖伦理”的所谓“劣行”，责令赵文静立即退学。并且把刘亚雄叫到校长室大加训斥。刘亚雄毫不畏惧，据理力争，慷慨陈词，要求校方收回成命。

校方对“放肆”大胆、不服管教的刘亚雄极为恼恨，但众怒难犯，害怕在“五·四”运动的风潮中引火烧身，于是不得不将开除赵文静改为记过处分。斗争的胜利使刘亚雄获得更多同学的信任，校当局却把“很不安分”的刘亚雄视为眼中钉。

“五·四”运动在深入，由初期的“外争国权，内惩国贼”，逐渐发展成具有强烈反帝反封建色彩的新文化运动。刘亚雄对新文化思潮异常敏感，和同学张心顺等以切身的体会，编写了一出反对封建礼教、宣传妇女解放的街头剧，预演时产生强烈的宣传效果，于是准备在校庆之日正式上演。但校方利用权力粗暴地取消了预期的演出。

蛮横的干涉激怒了广大同学，刘亚雄再次站出来与校方发生冲突。她和几个同学草拟了一份致学校当局公开信，亲自交到校长手里并与之谈判，坚决要求准予演出宣传真理。学校当局决定“杀一儆百”，宣布给刘亚雄记大过处分！

1921年底，刘亚雄从太原女师毕业，好不容易找到了女师附属小学做教师的机会。天真纯洁的孩子们使她精神熨贴，但是她感到天地过于狭小，决定报考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在父亲的支持下，她独自远行闯到人生地不熟的北京，又以优异的成绩被录取，先入国立北京女子高师附设补习学校，以极大的勤勉，一年内修完应当学习四年的英文、物理、化学等课程，1923年秋，正式进入北京女子高师文预科。

(三)

女师大，是国立女子师范大学的简称，它的前身，是1908年创建的北京女子师范学堂，辛亥革命以后更名为北京女子师范学校，1919年，改名为国立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校址设在北京宣武门内石驸马大街。刘亚雄在这里学习的第二年（1924年）改名为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也就是这一年，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北京“女师大风潮”。

女师大原校长许寿裳，是一位学识渊博、思想进步、关心青年的学者和教育家。由于抗议北洋军政府委任反动政客彭允彝为教育总长，他愤而辞去女师大校长之职。教育部头面人物正想除去所谓“标新立异”的新派人物许寿裳，所以立即准辞，改派杨荫榆走马上任。杨在学生面前滥施封建家长淫威，专横独断打击进步力量，引起广大师生的强烈不满。1924年4月23日，女师大15名教师联名宣布辞职，杨荫榆坚持顽固立场，高压变本加厉。8月，鲁迅先生寄还女师大聘书，学生们对杨氏的不满情绪愈演愈烈，双方对立激化，终于在11月，影响深远的学生运动和妇女运动——北京女师大风潮爆发了。刘亚雄走出书斋，站在了斗争的最前列。

刘亚雄积极投身女师大风潮绝非偶然。她从小培养起了反封建思想基础，又经过早期学生运动的锻炼，在北京女高师补校

学习时，她更真切地接触到了先进的革命思想。那时，她和赵世兰同居一室。赵世兰年长刘亚雄几岁，是我党北京地区领导人赵世炎同志的姐姐，对共产主义理想有着热烈的信念。在共同的学习生活中，赵世兰深刻地了解并十分喜欢对未来充满憧憬、朝气蓬勃的刘亚雄。从她那里，刘亚雄首次亲切地接触到一个共产主义信仰者，并且学习到先进的革命思想和辩证唯物论的革命理论。赵世兰带着刘亚雄多次出入陈启修、郑奠、马裕藻等进步教师家里，聆听他们有关社会、思想、学校改革的热烈讨论，刘亚雄的眼界随之开阔。正是通过赵世兰这个中轴线，刘亚雄又结识了比她高一班的许广平、陆晶清，并和同班同学刘和珍、郑德音等建立了亲密的友谊。这些学生，自然而然形成了中国共产党影响下的女师大进步学生力量的核心。

1924年11月上旬，杨荫榆以“蔑视校规”为由，无理开除了三名学生。同学们愤愤不平，赵世兰、许广平、蒲振声、郑德音、陆晶清、李桂生、刘亚雄等挺身而出，串联学生召开全校大会，成立了以许广平为总干事的“学生自治会”，并以此名义，向杨氏提出了抗议。杨荫榆拒绝抗议，辱骂学生们“犯上作乱”“不成体统”。杨氏的专横犹如火上浇油，学潮的烈火熊熊燃烧起来。

1925年1月22日，女师大学生自治会致函杨荫榆：“自到校来，不特毫无成绩，反而黑幕重重。”发出驱杨最后通牒。杨氏公开称学生自治会非法，并死赖着脸皮不走。北洋政府教育部首脑支持杨荫榆，反称她“能力虽嫌薄弱，然为人诚实纯正，实女界之翘楚。”刘亚雄肩负重担，专门奔走于兄弟院校、社会团体之间，联络社会力量和社会各界人士，并且几乎日夜不停，伏案刻写材料与同学油印出来在社会上广为散发。女师大驱杨斗争演变成社会两种势力的较量。

中国共产党对女师大风潮十分重视，高度评价了风潮反对反

动政府的重要意义，并派夏之栩同志到女师大了解情况，指导工作。刘亚雄经常和赵世兰、郑德音等人一起去北京地委书记赵世炎家里汇报工作，研究并听取斗争行动的指示。刘亚雄怀着敬意，多次出入鲁迅先生家，向他介绍学潮情况，倾听他的意见。

1925年5月7日，是国耻纪念十周年。十年前这一天，窃国大盗袁世凯，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今天，北洋政府残暴腐败有增无减，因此女师大学生集会声讨执政府暴政，会后汇集各校学生千余人游行示威，并愤怒地砸了教育总长章士钊的住宅。反动政府气急败坏，8月派刘百昭带领打手300余人闯进女师大疯狂镇压，殴伤学生10余人，并且封闭学校大门，停水断电，妄图以困死饿死迫使学生屈服。刘亚雄正在校外联络，她一面组织部分在校外的学生与警察展开说理斗争，一面募集包子、馒头、烧饼等大批食物，沿铁栅抛进校园供校内坚持斗争的学生食用，粉碎了敌人的阴谋。反动当局束手无策，8月22日，下令解散女师大。

刘亚雄和同学们并不屈服，在鲁迅、许寿裳、李石曾、谢无量、易培基、雷殷、陈启修等进步教授、学者的支持下，在西城南小街宗帽胡同十四号成立了新的女师大。刘亚雄和同学张平江亲赴张家口找冯玉祥将军捐款资助。女师大风潮终以倒行逆施的段祺瑞、章士钊、杨荫榆的失败，正义学生的胜利而告终。许广平、赵世兰、刘和珍、郑德音、蒲振声和刘亚雄等24名斗争骨干特意在校门口合影留念，鲁迅为照片题辞：“民国十四年八月一日，杨荫榆毁校，继而章士钊非法解散。刘百昭率匪徒袭击，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蒙从来未有之难。同人等敌忾同仇，外御其侮。诗云：修我甲兵，与子偕行，此之谓也。既复校，因摄影，以资纪念。十二月一日。”

在斗争中，刘亚雄在北京大学有幸几次见到李大钊同志，交谈中受到极大启示与教育，运动中又经受了严峻的考验，于1926年2

月，被光荣地接受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入党，意味着新政治生命的开端。刘亚雄肩上的担子更重了，她以女师大代表的资格，加入到北京市学联领导机构中。

刘亚雄入党一个月后，北京又一次爆发了震惊世界的“三·一八”惨案。

为抗议日、英、法、德、意、荷、比等帝国主义在津沽侵犯中国主权的强盗行径，北京学联各校学生于3月18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抗议集会，会后冲垮军警重重防线，来到铁狮子胡同段祺瑞政府国务院门口举行爱国请愿，遭到蓄谋已久的大屠杀。女师大刘和珍、杨德群及各校学生47人被打死，伤150多人。

刘亚雄当天身体不适，负责带领少量同学留守学校。傍晚，她听到惨案发生的消息，急忙带领留守部分学生火速赶赴惨案现场，和军警激烈斗争，将刘和珍、杨德群尸体抢出，怀着悲愤的心情，组织同学在肃穆的气氛里把尸体仔细擦洗干净。几天后召开隆重追悼大会，鲁迅等进步教授赶来参加，对死者表示了沉痛的哀悼和崇高的敬意。

惨案发生后不久，奉系军阀张作霖进占北京，疯狂镇压进步势力，开除20余名进步学生，刘亚雄即在其中，她在北京处境危险。7月，北伐军从广东分三路出师北伐，攻克武昌，军队需要我党干部，于是党准备让刘亚雄去武汉参加北伐。正当刘亚雄赶回太原向父亲告别，回京后一心希望投入战斗的军旅生活之时，我党为了培养一批坚强的后备力量，决定刘亚雄、郑德音、蒲振声、雷瑜等4名年轻的女共产党人，改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6年9月中旬，刘亚雄离开女师大，离开北京，踏上了新的征途。

(四)

刘亚雄取道上海，秘密乘苏联轮船，到达海参崴，一周以后

和赵玉蓉、方乐舟、廖竹君、张西酬、孔祥贞等30余人乘火车沿西伯利亚铁路行驰13天，到达莫斯科，进入中山大学。

莫斯科中山大学，成立于1925年9月，是中苏友好与国共两党合作的产物。这座经苏共中央批准建立的大学，是专门为中国共产党培养干部的高等政治学校。学生中国国民党员居多，我党也选派有一批干部到这里学习政治、军事理论。刘亚雄等一批新学员编为七、八两个班，她是第八班学生。

刘亚雄入学前不懂俄语，所以入学后半年里主要攻读俄语，每周六天强化密集速成教学。刘亚雄以顽强的刻苦学习精神和聪颖的智慧，九个月便达到了俄语视听的基本要求。以后，刘亚雄把全部精力投入马克思《资本论》，以及《中国革命运动史》、《东、西方革命运动史》、《列宁主义基础》，哲学、政治经济学、地理学和军事理论，学习成绩突出，半年内跳班一次。

中山大学的教学，遵循着理论与实践并重的原则，男同志要进行一段严格的军事训练，女同志则要到医院里去进行护理实习。同志们经常去莫斯科市、郊区工厂参观，与工人群众与生产实际接触，加深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感性认识。刘亚雄的足迹遍及苏联南方各地，并访问过列宁格勒，巡视了不少工厂和船坞，瞻仰了夏宫、冬宫，参观了斯莫尔尼学校。苏联革命的历史进程在刘亚雄头脑里变得更加切实，进一步坚定了共产主义的信仰。

在这里，刘亚雄结识了年轻有为的共产党人陈原道同志，确定了个人生活的归宿。

陈原道，安徽巢县青岗人，1901年4月出生在贫苦的农民家庭里，学生时代即参加进步学生运动。他1922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安徽学运与工人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同年10月，党中央派他来莫斯科中山大学深造。刘亚雄经常得到他的帮助，他们常常在一起研讨社会、革命问题，遂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1924年4月12日，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蒋介石背叛革命，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举起了血腥的屠刀，国共两党合作宣告破裂，中国笼罩着白色恐怖的阴云。在这种形势下，革命与反革命的你死我活的斗争异常尖锐，莫斯科中山大学的中共学员陆续回国参加斗争。1928年底，根据党的指示，刘亚雄中辍学业回归祖国，以崭新的思想境界和旺盛的革命斗志，精神百倍地投入到国内尖锐、复杂的民族解放斗争的洪流之中。

(五)

刘亚雄和两位男同志与另一位女同志秘密从西伯利亚涉过乌苏里江，应付过好几次险境来到北方名城哈尔滨，在一家肮脏的小客栈里与地下党接上了关系，取道大连坐轮船到达党中央所在地上海。1929年3月，被分配到中共江苏省委任宣传干事。不久陈原道同志奉命回国抵上海，也分配在宣传部任职，两位亲密的同志，又并肩战斗了。

那时，环境艰险，生活艰苦，宣传部工作人员也很少，部长任弼时同志很忙，每周一次来听取汇报、指示工作。秘书长陈原道承担着部里的实际领导工作。中国军阀连年混战，战火不断，广大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黑暗、腐朽的反动政治，给全国的革命形势火上浇油。我党领导的红军武装不断壮大，农民运动的烈火熊熊燃烧，上海的工人运动亦开始发展起来。刘亚雄负责情报资料收集工作，剪辑报刊，汇编各地情况报告，向上级提供第一手参考资料；同时，按照任弼时、陈原道同志的指示，与另一位同志亲自动手写些小型宣传文章，印成传单，向上海各界散发，并且经常变换装束出入上海各工厂从事工人运动。刘亚雄很快成为我党活跃的基层妇女干部。

1929年8月，刘亚雄调中央组织部，主管秘书文书等工作。

党中央这个重要部门设在上海静安寺爱文义路一条隐蔽的胡同里，机构设置精简。部长周恩来，副部长罗登贤，恽代英任秘书长。刘亚雄所在组织科，除科长黄介然外，工作人员仅二三人。人员虽少，工作量却很大，全国党组织关系，除省委以上负责干部由中央另立档案直接掌管外，全部由中组部组织科管理。刘亚雄分工专门经管人事档案、机密文件，而且负责各地党员干部来沪工作的接头工作，她工作细致深得组织好评。

1930年夏，由于国共两党关系进一步恶化，大批我党留苏学生回国战斗。刘亚雄频繁地与回国同志接头，按中组部决定向他们传达指示安排工作。刘亚雄每次外出都变换衣装，连戴不戴眼镜都要预先考虑周全。闸北工人居住区一位女工党员干部面临暴露危险，刘亚雄多次换车前去安排转移，那条长长的胡同门面外型几乎一般模样，首次前来的刘亚雄又不能东张西望查找门牌号码，于是神态自若地缓步前行，心中默记门牌号码，机智地应付过房东的猜疑，迅速地通知到这位同志安全转移。

革命形势风云变幻，我党同志们的工作难分昼夜。周恩来、恽代英等领导同志常在夜间来中组部听取汇报、指示工作，研究分析形势。刘亚雄往往担任会议记录，聆听到他们的精粹见解，感受到他们的模范风貌，获得很大教益。

1930年9月，党的六届三中全会在上海召开，结束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在党内的统治。不久，党内新的“左”倾路线又开始抬头。1931年1月党中央召开了六届四中全会，打击了以瞿秋白同志为首的所谓犯“调和路线”错误的同志。会后中央决定有系统地向全国各地派遣中央代表和新的领导干部，抽调大批干部赴各地党组织机关传达四中全会精神。刘亚雄被委派往山西省传达全会精神。1931年1月下旬她起程，由黄浦江乘海轮北上天津，然后赴太原传达一个多星期，再返天津，接到了让她留在天津工作的指示。

(六)

中共顺直省委设于天津。时值省委由于党内分裂主义分子张慕陶等人的破坏捣乱而处于瘫痪状态，中央派陈原道同志为首的工作组进行了有力整顿，改为河北临时省委。刘亚雄来到之时，新省委的危险并未消除，省委工作人员张开运和新工会工作人员韩麟符被捕叛变后，领着宪兵特务整天游荡于街头巷尾抓捕共产党人。就在这严重关头，刘亚雄留在天津接任省委秘书长之职，并和陈原道同志结婚。工作环境是凶险万分的，有一次执行任务途中被特务盯梢，好不容易躲进澡堂才甩掉了“尾巴”。由于新省委必须尽快统一被分裂分子搞乱了的思想，以便端正党的斗争方针与策略，形成协调的行动步骤，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河北新省委决定于4月8日在吉仙里××号召开一次省、市、地方党委负责干部的联席会议。不幸开会前一天，一位女同志去火车站秘密联络信箱取函件，被反革命鹰犬跟踪，暴露了会议地点。当天深夜宪兵突然包围这所房子捕获了已赶到的各地党的代表，然后特务设下“蹲坑”陷阱。第二天开会的日子，省委主要负责人徐兰芝、陈原道、刘亚雄等分别赶来开会，一一被捕，河北新省委遭到极大破坏。

刘亚雄等30多名共产党人在英租界扣押，不久转押天津公安局，在敌人的严刑逼供下，徐兰芝叛变，供出了刘亚雄等共产党人的真实身份。刘亚雄坚强不屈，对无耻叛徒抱以极大蔑视。

天津公安局此时为张学良部所辖，由于军阀之间的嫌隙，对政治犯不大愿意承担上面交给的责任，看管不十分严格。牢中犯人以绝食等联合斗争获得了“女犯人”重病可以由看守押解监外就医的权利，刘亚雄利用机会给父亲刘少白发出了一封短信。

刘少白于1929年应傅作义将军之邀，任天津商品检验局副局长，举家迁来北平，住虎坊桥绒线胡同晋阳饭庄旁院。这所著名

的“刘公馆”，发挥着中共秘密联络站的作用。刘少白是我党地下工作忠诚可靠的秘密联络人。他接到女儿来信，便火速赶往天津，利用傅作义将军的旧交影响，每天奔走于上层人物之间，营救刘亚雄等一批共产党人。就在救人有望的关键时刻，北平市委的负责人之一郭亚先被捕叛变。他认识刘少白，带领宪兵特务破坏了“刘公馆”。刘少白在天津得到了处境危险的消息，不得不转移到山西去，营救天津被捕同志的计划中途夭折。

1931年9月初，刘亚雄等一批共产党人被押解北平，关押于张学良海陆空军副总司令行营军法处。此处级别高于平、津宪兵司令部和警察局，处长是恶名昭彰的“活阎王”颜文海。该处属于奉系“元老派”，素与北平宪兵司令部奉系“新派”存有矛盾，所以对集中在这里的百余名政治犯偏要独立对待，另行其事。于是狱中被捕同志利用机会搞起“翻供”斗争。正值军法处忙于审讯保定蠡县暴动案，一时顾不上这批未“持枪暴动”的政治犯，于是匆匆判刑，原判死刑一律改为有期徒刑。刘亚雄也进行翻供，被判刑两年。10月初，军法处将已经判刑的政治犯都关押进草岚子监狱，于是刘亚雄开始了一场更加艰难、复杂、充满凶险的特殊战斗。

（七）

草岚子监狱，正式建于1931年9月，最初为看守所，1932年3月改名为“北平军人反省院分院”（总院设于南京）。这座监狱，是专门关押平、津两地被捕共产党人的处所。

刘亚雄关进草岚子监狱时，女犯不多，仅8人。她和蒲秋潮、郑倚虹（郑德音）、张炳三名政治犯关在一起。

监狱里关押的政治犯情况相当复杂。最初关押着平、津被捕的殷鉴、陈原道、薄一波、安子文、刘澜涛、杨献珍、刘锡五等河北省委、北平市委的领导干部，以后又陆续由其他监狱转来了拒